

夏商周时期华夷之辨观念的萌芽与奠基

——基于《尚书》的文化中心意识与天下秩序探究

毛婉莹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8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30日

摘要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键概念，“华夷之辨”的源头深植于《尚书》所构建的三代叙事脉络之中。文章以《尚书》为核心史料，结合《史记》相关记载，在辨析文本成书年代的基础上展开剖析。《尧典》《禹贡》等篇虽非夏代同期档案，而是战国儒家追述古史的政治书写，但其所载“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与“五服”制的空间规划，已折射出周汉时期以华夏文化为中心、以道德礼教为评判尺度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叙事倾向。这种回溯性的政治想象，将早期血缘族群的划分逐步转化为基于文化认同的区分标准，搭建起华夏正统与天下秩序的基础叙事框架。这不仅为后世“用夏变夷”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依据，也为儒家思想中“华夷观”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与理论准备。

关键词

夏商周，“华夷之辨”，《尚书》，文化中心意识，天下秩序

The Emergence and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during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entralism and the World Order Based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Wanying Mao

School of Publish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Received: August 23,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文章引用：毛婉莹. 夏商周时期华夷之辨观念的萌芽与奠基[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0): 25-30.
DOI: 10.12677/jc.2026.1410256

Abstract

As a pivotal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Three Dynasties narrative constructed in *The Book of Documents*. Centering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drawing on relevant account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extual formation of these classics before examining their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Although chapters such as the “Canon of Yao” and the “Tribute of Yu” are not contemporaneous archives from the Xia dynasty but rather retrospective political writings by Warring States-period Confucians, they nonetheless articulate a political ideal of “harmonizing the myriad states” and a spatial scheme of the “Five Zones of Tribute”. These formulations already reflect the narrative tendency of the Zhou-Han period to regard Huaxia culture as the center and moral rites and teachings as the criterion of judgment, namely “treating the various Xia as inner and the Yi and Di as outer”. This retrospective political imagin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ed early divisions based on kinship and lineage into distinctions grounded in cultural identity, thereby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al narrative framework for Huaxia orthodoxy and the ideal of world order. This imaginative framework not only lent historical legitimacy to the later doctrine of “transforming the Yi through Xia”, but also laid solid textual and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the maturation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the “Hua-Yi view”.

Keywords

Xia, Shang, and Zhou, “Hua-Yi” Distincti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Cultural Centralism, World Ord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目前学界对于“华夷之辨”的探讨，大多聚焦于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对夏商周三代的萌芽与奠基过程关注不足，且相对忽视了其观念溯源中的文本建构性。尽管《尚书》作为三代政治文献的汇编，为研究早期华夷观念提供了核心材料，但其各篇章成书年代跨度大，涉及夏代史事的《尧典》《禹贡》等篇多为后世追述，并非夏代同期原始档案。鉴于此，本文主张深入辨析这些文本的书写语境，厘清其中“华夏中心”叙事的层累形成过程。这不仅能避免将文本记载直接等同于三代史实，厘清“华夷之辨”的早期样貌，更能深刻揭示周汉儒者如何通过建构早期天下秩序为“华夷之辨”赋予历史合法性，进而把握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演变逻辑，为理解当代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方法论启示。

2. 文献综述

关于《尚书》史料，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强调“五服”制体现了“协和万邦”的华夏中心秩序，而顾颉刚、刘起釪等近现代学者则指出，《禹贡》中的五服制蕴含着以空间为基准的政治等级观念。这种从传统经典文化到历史具体研究的视角转换，反映了学术界对先秦天下观认识的角度多样化和纵向深化。在《史记》研究方面，以钱穆、许倬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司马迁通过《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篇目，系统构建了华夏共祖谱系和制度创设的正统叙事^[1]。这种历史书写不仅确立了华夏文明主体性，也为后世理解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提供了基本框架。从发展历程看，天下观萌芽于史前时期，李宪堂指出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人一体的秩序观是其逻辑起点。至西周时期，钟春晖强调“西土意识”和“天命观”成为推动天下观形成的重要动力，周人通过从地域意识到天下观念的转变，打破了狭隘的地域局限。

而先秦时期的华夷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动态特征。西周时期强调“非我族类即为夷狄”，带有鲜明的主观意识和族群偏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严华夷之别”与“华夏一体”两种并存的概念，夷夏界限随着族群融合的深入而不断调整。蒙文通、徐复观等学者强调，夏商周三代时期以德政为核心的文明优越论为“华夷之辨”提供了伦理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更表现在道德教化方面，从而为处理华夷关系确立了价值标准[2]。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纵向的五帝世系和横向的族群叙述，构建了“华夷同源”的认同体系。这种历史书写不仅为华夏族群提供了认同基础，也为夷狄族群参与中原事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近年来的研究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辨析相结合，有效打破了传统文献学的局限，为理解早期华夷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现有成果多偏重于单一文献考释或后世思想阐释，缺乏对夏商周三代观念演变的系统梳理与内在逻辑分析，且在史料运用上常忽视《尚书》各篇的成书差异。因此，本文主张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据刘起紘《尚书学史》、顾颉刚《尚书通论》等研究，《尧典》《禹贡》均非夏代同期文献，前者主体成于战国早期，融汇了周人“敬德保民”与儒家“大同”理想，后者则是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潮下对天下地理与贡赋制度的系统性构想，其“五服”制亦属战国学者的政治想象；相较之下，《盘庚》保留了较多商代语言特征，《周书》中《康诰》《梓材》等篇多为西周初年官方文书，史料可信度较高[3]。本文对三代华夷观念的梳理，本质上是厘清《尚书》文本所呈现的观念演变脉络，而非直接还原三代史实。特别是对夏代相关内容的讨论，本文严格以《尚书》的叙事逻辑为对象，不预设其与夏代史实的对应关系，旨在从长时段视角揭示周汉儒者如何通过建构早期天下秩序，为“华夷之辨”赋予历史合法性，进而推动该领域研究在理论深度与史料方法论上的双重深化。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一种通过系统收集、整理、解读和分析各类文献资料，来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特征、规律或内在联系的研究方法。它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尤其适合研究历史现象、社会变迁、文化观念等问题。本研究以《尚书》为主要文本，辅以《史记》等对三代的追述，进行原文细读与义理阐释。同时，以前人所著学说及文献为参考，对研究内容进行深入探究。

3.2. 比较归纳法

比较法通过对比不同对象的特征找异同，归纳法则从个别案例中提炼普遍规律。二者结合使用时，先通过比较识别研究对象的具体差异与共性，再从共性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或从差异中总结特殊规律。本文通过对比夏、商、周三代相关表述的异同，力求归纳总结出三代华夷观念的发展轨迹。

4. 研究内容

4.1. 华夏中心意识萌发协和万邦至五服构想

华夏中心意识早期萌发，体现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与《尚书·禹贡》“五服”的制度中，二者共同摹写了当时以华夏为枢纽的天下观雏形。《尚书·尧典》中，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治理逻辑，虽未明言华夷之分，却暗含以华夏部族为核心，逐步整合四方邦国的意识。“九族”、“百姓”可视为华夏血缘与礼法的初始核心，而“协和万邦”的最终

指向则是将周边多元部族纳入以华夏为主导的秩序体系。这种整合以“德”与“睦”为纽带，既体现了包容性，更包含着华夏作为天下秩序主导的枢纽地位，成为后世华夏中心意识的早期萌芽。在此基础上，《尚书·禹贡》的“五服”制度进一步从空间层面构建了层级化的天下秩序。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明确指出，华夏通过空间距离的递减实现政治控制与文化影响的梯度扩散，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等级结构。其中“声教讫于四海”的理想，更强调华夏以礼乐文明感化四夷的文化中心意识。华夏无需武力征服，仅需通过文化辐射便可维系天下秩序，这一理念成为后世“用夏变夷”思想的源头[4]。

尽管此阶段的华夏中心意识尚处萌芽状态，却已为后世“华夷之辨”奠定了思想基础。《尚书·尧典》的“协和万邦”侧重从部族整合的动态过程显现华夏的核心地位；《尚书·禹贡》的“五服”制度则以静态空间规划强化了“内服”到“外服”的层级秩序，二者共同指向华夏作为天下文化与秩序源头的自觉。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意识此时仍停留在文本建构层面。“协和万邦”是儒家对部族融合的理想化想象，“五服”制更是战国大一统思潮下的制度构想，皆非夏代真实的政治实践，这一时期尚未形成明确的礼义区分标准，更多是对政治理想与空间秩序的设想。华夏不仅是地理核心，更是文化与秩序的源头，四夷在华夏的“协和”与“声教”中被整合为天下的一部分。这种早期构想虽未发展为严格的“华夷之辨”，却通过回溯性的历史书写，将华夏塑造为天下秩序的天然中心，为春秋时期“严华夷之别”的现实需求提供了思想原型与历史合法性依据，推动华夏中心意识从文本想象逐步走向更具规范性的制度实践。

4.2. 商代族群区分与重刑轻德初现华夷界限

《盘庚》是《尚书》中少数保留较多商代语言特征的篇章，其反映的重刑轻德倾向，更接近商代真实的治理逻辑，与后世追述的夏代叙事形成对照。在商代多族群并存的政治环境中，暴力震慑与高压统治是其处理族群关系与实施治理手段的特征。不同于后世儒家“德主刑辅”的主张，商代政治的核心逻辑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即重刑罚而轻德教[5]。《尚书·盘庚上》一篇中，盘庚迁都至殷时虽口头谈及“明德”，但这并非为感化民众，而是服务于树立绝对权威的需要。面对顺服的商民，他利用“天命”进行精神施压；面对反抗的商民或挑战王权的外族，他毫不掩饰地展现“罚”的残酷，甚至扬言要“剿殄灭之，无遗育”，断绝其后代。此时，“德”沦为了掩盖暴行的遮羞布，而“刑”才是维持统治的实权，表现出商人作为“我者”对异质“他者”的支配心理[6]。

更关键的是，商人试图通过垄断神权与祭祀文化，构建起排他性的暴力符号体系，使族群区分从政治压迫升华为文化隔离。商代的青铜器、礼器及祭祀仪式是专属于商人贵族的特权工具，具有极强的神秘性与排他性。《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失德导致“太师、少师持其祭乐器奔周”，这侧面印证了这些文化载体是商人统治合法性的核心依托。此外，商代通过频繁占卜与人牲制度来强化对异族的震慑。可以说，商代通过重刑轻德的治理、军事征服的扩张与神权文化的垄断，不仅将族群界限从朦胧的天下观转化为残酷的政治现实，更在“我者”与“他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这种以暴力和神权为壁垒的区隔，标志着“华夷之辨”作为一种关乎生存与排斥的族群意识，已由早期构想落实为可操作的政治实践，为后世华夏中心主义中“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奠定了最原始的基调。

4.3. 周代礼义制度与天下秩序系统化奠基“华夷之辨”

《尚书·周书》诸篇多为西周初年官方文书，其“德治”、“礼义”相关表述，是周人现实政治实践的记录，为后世建构夏代叙事提供了思想内核。周代将“华夷之辨”从零散实践升华为系统政治文化原则，核心是以“礼义”为根基，通过“德治”与“攘夷”构建天下秩序，完成华夏中心意识的制度化奠基。《尚书·周书》记载的几篇内容奠定这一原则的基调，如《康诰》强调对华夏施行明德慎罚，对夷狄

则加以“威服”；《梓材》主张对迷乱之民“先教后惩”；《牧誓》与《费誓》更以武王伐纣、鲁侯征讨徐戎淮夷为例，践行了“文德感化为主，兵戈征讨为辅”的原则[8]。这种柔性感化优先、刚性威慑为辅的策略，使“华夷之辨”超越族群区分，成为维护天下秩序的核心准则。

为支撑这一准则，周代通过分封制与礼乐制度将华夏礼义融入天下格局，固化文化圈。分封并非简单疆域分割，而是周王室的文明扩张。同姓诸侯推行周礼，异姓功臣需修治礼仪，作为宾客参与周王室活动；宾服的四夷之国若接受册封与礼义约束，包括称臣纳贡、参与会盟，也可纳入华夏边缘[9]。《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制礼作乐，通过礼器、礼仪、乐舞的标准化，使礼义成为区分华夷的重要标识。学者杨向奎指出，分封制下的诸侯列国是以礼义为纽带的文明共同体，礼乐制度如无形边界，将认同者纳入秩序，不认同者视为化外，以制度固化文化认同。

至此，周代将“华夷之辨”确立为礼法纲领，为后世儒家继承。周人通过传世文献中的德治思想、分封实践及礼乐制度，构建起一个完整体系。在此体系中，华夏被定义为行礼仪者，夷狄则为不行礼仪者。这意味着周人开始以礼乐而非血缘作为划分族群等级的标准，从而使“华夷之辨”成为衡量政治合法性与文化先进性的核心尺度[10]。学者徐复观曾指出，周代“德”与“礼”的结合，以及相应的攘夷策略，赋予了其“修己安人”的伦理正当性。该原则不仅支撑了西周天下共主的秩序，更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儒家提炼为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的理论核心。同时，也标志着“华夷之辨”从早期萌芽最终锻造成型，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年民族观与天下观的系统性原则，完成了观念的制度化奠基。

4.4. 三代“华夷之辨”对后世思想的影响与历史定位

夏商周三代在观念与实践层面的探索，为后世中华多元一体民族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思想与制度资源，其奠基作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夏代以协和万邦与五服构想开启华夏中心意识的萌芽，通过空间政治整合描画出天下有序的雏形；商代加入重刑轻德的治理手段与青铜礼器、甲骨文字等文化标识，使族群区分开始渗入文化符号的考量；周代则以礼义制度为核心，将德治优先、文化感化与礼法规范转化为系统的华夷判别标准，确立文化认同高于血缘地缘的原则。这些思想资源经儒家提炼升华，成为后世华夷观的核心[11]。孟子提出“用夏变夷”，主张以华夏礼义感化夷狄，使其转化为华夏一员，正是对周代修文德以来之理念的继承。而礼义制度所蕴含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更成为儒家评判族群文明程度的根本尺度，使德治与文化感化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观中极具韧性的精神基因。

在制度层面，三代开创的“分封”、“朝贡”与“五服”等模式，为后世王朝处理多元族群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夏代“五服”构想以王畿为中心的空间层级设计，启发了后世天下秩序的空间想象；商代与方国稳定的贡纳征伐关系，奠定了朝贡体系的早期雏形；周代分封制通过封赐同姓异姓诸侯与宾服之国，将礼义制度推广至边缘地区，形成内服外服的政治架构，《汉书·匈奴传》追述汉代制度时便直言汉承周制，可见周代以礼义为纽带的“分封”与“羁縻”思路对后世影响深远。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出，三代制度实践的精髓在于以柔性手段维系多元族群的统一，既承认族群差异，又以文化认同凝聚向心力，这种模式为秦汉以降大一统王朝处理华夷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如汉代对边疆族群设郡县、置属国，既保持管控又尊重其习俗，正是对三代分封朝贡智慧的创造性转化[12]。

从历史定位看，夏商周三代“华夷之辨”是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源头，它使华夏文明在文化上保持了强大的连续性与向心力。春秋战国时公羊传提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将周代礼义标准进一步系统化。汉代面对匈奴等强邻，虽强调严华夷之防，却仍以是否接受华夏礼义为最终判别依据，如汉武帝独尊儒术，实则是以儒家礼义强化华夏文化认同以抵御夷狄。这种以文化为根脉的华夷观，既避免了狭隘的血缘排斥，又能在多元互动中不断吸纳异质文明，使华夏始终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品格。可以说，夏商周三代“华夷之辨”不仅塑造了早期华夏的自我认知，更通过德治、礼义与制

度的三重奠基，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铺就了思想与历史的底色。

5. 结语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华夷之辨”观念从文本建构到制度奠基的关键阶段，对这一过程的系统探究，必须回到《尚书》这一核心典籍的书写脉络之中。《尚书》通过《尧典》《禹贡》等追述性篇章，建构了夏代“协和万邦”与“五服”的天下秩序叙事，折射出战国儒家视野下的华夏中心意识；及至商代，《盘庚》篇保留的商人“明德慎罚”差异化治理逻辑，结合甲骨文中“多方”、“某方”的称谓与方国体系，以及青铜礼器、占卜文字、祭祀仪式等文化标识的排他性，使华夷界限由朦胧的文本构想转为可操作的政治文化实践；再到周代，《康诰》《梓材》等西周初年官方文书将德治与攘夷思想系统化，分封制与礼乐制度把礼义规范确立为判别华夷的核心标尺，从而实现了天下秩序的制度化与理论化。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书写与治理实践，共同塑造了以华夏文化为中心、以礼义德政为区分标志的天下秩序观。这一观念不仅是三代政治合法性的内在支撑，更成为后世儒家与历代王朝处理华夷关系的思想基石。它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根脉，以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或地缘作为凝聚纽带，赋予“华夷之辨”以传承与延续性。深入探究这一观念的建构与奠基过程，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为理解传统民族观的书写特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同时为当代思考多元文化共存与文明互鉴保留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 [1] 李艳峰, 王文光. 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2): 55-59.
- [2] 李玉君. 华夷之辨·华夷之辩·华夷之变——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再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64(2): 139-149.
- [3] 冯盛国.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 [4] 曾颖娟. 《尚书》万邦治理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 [5] 侯孟琦. 先秦时期天下观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6] 张富祥.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J]. 文史哲, 2013(1): 22-38+165.
- [7] 赵永春.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J]. 学习与探索, 2012(1): 148-156.
- [8] 于逢春. 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7(2): 21-34+148.
- [9] 王灿. 《尚书》历史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1.
- [10] 王文光, 马宜果. 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J]. 昆明学院学报, 2023, 45(1): 14-22.
- [11] 黄纯艳. 论华夷一统思想的形成[J]. 思想战线, 1995(2): 45-50.
- [12] 马成俊, 刘子平. 华夷一体: 先秦时期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探析[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4): 21-26.